

The Middle East

# 中东两千年

【英】伯纳德·路易斯◎著

（台湾）郑之书◎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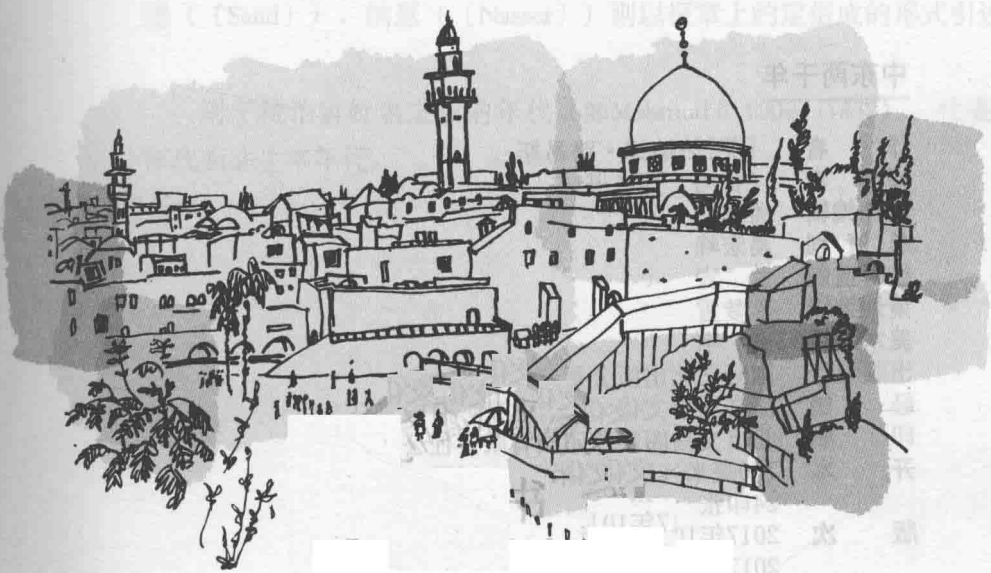
ISBN 7-309-04211-7

The Middle East

# 中东两千年

【英】伯纳德·路易斯◎著

(台湾)郑之书◎译



次  
307  
号  
128  
价  
58.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两千年 / (英) 伯纳德·路易斯著; 郑之书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7. 10  
ISBN 978-7-5125-0991-7

I. ①中… II. ①伯… ②郑… III. ①中东—历史 IV. ①K37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0546号

THE MIDDLE EAST

copyright © Bernard Lewis 1995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a division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 中东两千年

作者 [英]伯纳德·路易斯  
译者 (台湾)郑之书  
责任编辑 潘建农  
总策划 葛宏峰  
统筹监制 兰青  
策划编辑 李梦雪  
美术编辑 秦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24印张 330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991-7  
定 价 5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序



坊间现有多种单卷装的中东历史著作，它们绝大多数不是以基督教降世之时为结尾，便是以伊斯兰教的降临为开端。我以基督纪元开始作为本书的时间上限，是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拯救通常被赋予无足轻重地位的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还有前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历史，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传道事业的部分背景，也是创建伊斯兰教国家的部分背景。这些在几百年来共有或分据中东的敌对势力，不应该只以三言两语草草带过。第二个目的，是希望把我们今日所知的中东，和我们自远古文献及遗迹中所理解到的中东远古文明联系起来。在基督纪元的头几个世纪——也就是说，在耶稣到穆罕默德两者之间的时期——波斯帝国以西的地区，已经由于希腊化、罗马化和基督教化这个持续的进程而转化了。于是，对于这些古文明的记忆，也都被抹去（虽然不是连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那段历史要到相对来说很近代的时候，才又因考古学家和东方学研究者的努力而重见天日。可是，从远古中东到现代中东之间，经过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那没有间断的联系，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如果是在现代早期想要写本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书，非得紧扣着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的脉络不可，因为少了这种史实顺序，再深一层的历史会更难——若不说是“不可能”——彻底明白。感谢前辈的研究成果，使我比起他们更能

放手去把政治方面的叙述减到最低，而着力用心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的转变。依此观点，我在文中频频引用各个时代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包括有编年记录、游历记录、文件与碑铭，有时候甚至是诗歌和轶事。要是适当的英文翻译派得上用场，我便征引它们；要是没有，我就自己译。图片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大家看了图片，或可得到叙述甚至剖析所未能立即提供的印象。

不管是谁，只要是想要以单册的篇幅写尽这般丰富多元又生动活泼的两千年历史，必定得省略掉一些重要的史事。每一位中东史的学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且免不了是很个人的选择。我试着对个人认为最具特色和最富启发意义的功业、事件、趋势和成就，给予公正的评价，而我所做到的程度，留待读者来判断。

最后，我很荣幸记下我对于四位普林斯顿大学年轻学者的感激和谢意，他们是大卫·马梅尔 (David Marmer)、麦克·多兰 (Michael Doran)、凯·埃里奥特 (Kate Elliott) 和珍·鲍恩 (Jean Baun)。四人在本书的筹备阶段和写成过程中，都做出各式的协助。我尤其对珍·鲍恩负歉良多，其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批判之敏锐，无时无刻不是最为珍贵。我也想对我的助理安娜玛丽·莎米纳罗 (Annamarie Cerminaro) 表示感激，她仔细而有耐心地处理这部书的几次修订稿，从第一次的草稿，到最后的定稿。在编辑、选图和刊行此书方面，大大有赖于本杰明·布坎 (Ben-jamin Buchan)、汤姆·格拉夫斯 (Tom Graves)，和编制索引的道格拉斯·马太 (Douglas Matthews) 的技术协助与耐心。他们在加快编书的过程和增进成品的质感方面，都费了不少心力。

对于那些给出许多建议并被接受的人，我谨在此表达谢意；对于那些给出许多建议但并没有被我采纳的人，我谨在此表达歉意。在做了这个说明之后，显然，本书不尽完善之处，就全是我个人的过错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 于普林斯顿

# 目录

## Contents

第四卷 第4章

151	家園	章八第
180	根源	章九第
171	英曆	章十第
181	众大	章十一第
200	新武周端宗	章二十第
232	外文	章三十第

### 序

### 第一部 绪论

#### 绪论

003

### 第二部 先祖

#### 第一章 基督教时代以前

021

#### 第二章 伊斯兰教时代以前

034

### 第三部 伊斯兰教的初生和巅峰

#### 第三章 伊斯兰教的创始

051

#### 第四章 阿布斯哈利发朝

073

#### 第五章 草原民族西进

083

#### 第六章 后蒙古时代的转圜

097

#### 第七章 弹药帝国

106

# 目录

## Contents

### 第四部 横剖面

第八章 国家	127
第九章 经济	150
第十章 精英	171
第十一章 大众	196
第十二章 宗教和法律	209
第十三章 文化	235

### 第五部 现代的挑战

第十四章 挑战	263
第十五章 改变	276
第十六章 回应与反弹	294
第十七章 新观念	304
第十八章 从战争到战争	322
第十九章 从自由到自由	346

070  
073  
080  
087  
101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 绪 论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东城市里，咖啡馆——或是茶栈——是非常普遍的景观。几乎全天的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在那里看到男人们——通常也只有男人们——坐在桌旁啜饮咖啡或茶，或许还叼根烟、看看报，玩着一种棋盘游戏，让放置角落的收音机或电视机所发出的声响，半听不听地传入耳中。

这些小咖啡馆的顾客就外表来看，和坐在欧洲小咖啡馆里的那些人，尤其是地中海国家小咖啡馆里的那些主顾，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他却和五十年前坐在同一个地点的老前辈，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若是和一百年前的祖先比起来，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这点对于坐在欧洲小咖啡馆里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可是这两个例子背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这段时期，欧洲人于外表、举止、装束和行为上所发生的改变，几乎全是自发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些都是源自社会内部的改变，即使是近来那些少数例外，也是来自有着密切联系的美洲社会。

可是中东地区的改变却大多是源自外部世界，来自于与中东本地传统大大相异的各个社会和多种文化。从那个待在咖啡馆里，坐在椅子上，靠着方桌，读着报纸的男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项转化了他的生活和他父母亲生活的转变的缩影——他看起来的模样、在做的事情、他怎样穿着，甚至包括他做的是职业，都标志着那些来自西方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东地区的改变，那些广阔无边又有着无比毁灭性的改变。

首先，是最明显而且一眼就看得到的改变，那就是他的穿着。他当然还是有可能穿着传统服饰，不过这在城市里面，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最可能见到

的，是西式打扮的他：衬衫西裤，或今天常见的T恤和牛仔裤。穿着当然蕴含重大的意义，衣服并不只是用来御寒防湿和保持礼貌的，它同时也是——尤其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个人身份的标志，可用来判定个人出身所属，并作为我们和他们的分辨标准。早在公元前第七世纪，先知西番雅（Zephaniah）就曾在书中写明：“到了我耶和華献祭的日子”，上帝会惩罚“一切穿外邦衣服的”（旧约《西番雅书》第一章第八节）。在犹太教和后来的穆斯林文书中，也都要求信众不可穿得像不信者那样，要维持他们本身特有的打扮。“别穿得像异教徒，除非你变得像他们那样”，这是句常见的训谕。根据一段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传，“缠头巾是分开不信与真信的藩篱”。另一段圣传又说：“企图要打扮得像别人的人，就成了那群人的一个。”一直到了非常晚近的时期——在一些地方甚至到了今天——每个种族上的团体、每个宗教上的宗派、每个部族、每个地区，有时候甚至于每个行业，都有着本身独特的穿着方式。

很可能，坐在咖啡馆里的老兄仍然穿戴着某些形式的头饰，或许是一顶布帽，或许是一些更为传统的头饰——后者在土耳其除外。任何一个看过奥斯曼（Ottoman）时期墓园的人，应该都会对下面这个事实印象深刻：那就是许多墓碑上都刻有死者生前所戴的头饰图样。若他是位法官（kadi），墓碑上就会刻有法官的便帽；若他是位新军士兵，他的墓碑顶上也会戴上新军特有的头饰，像条折起来的袖子那样。不管墓主生前从事哪种生计，代表其生前行业的头饰都会像个标志般，出现在他的坟墓上。由此可见头饰的必要性有多大，即使死后都得如影相随，那么生前的情况就更不必说了，直到不久之前，土耳其文俗谚“戴帽子”（sapka giymek, put on a hat）的意思，就和早期的一句英语俗语“把大衣翻过来”（to turn one's coat）一样，指的是叛教、变节或投身对方阵营。到了今天，大部分不管原先戴的是哪种头饰的土耳其人，都换上了各式各样的有檐帽、无边帽或——虔诚信众的——羊毛小扁帽，于是，这个俗语遂失去了意义，因此也不流通了。不过，西式的头饰在阿拉伯地区仍然少见，在伊朗更是罕有。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穿着的西化，尤其是头饰的西化，来验证中东地区现代化的几个阶段。

衣着的转变，就和大部分的现代化层面一般，是从军队开始的。对于改革分子而言，西式军服对他们有着一种魔力。穆斯林的主政者是在穆斯林的军队于战场上不断受挫之后，才迫于时势勉强接受了其对手的军械，同时也接受了

他们的组织和装备，包括西式制服。当十八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组织其第一支改良部队之际，他们的确非得要接受西式的操练和武器不可，但是采用西式制服却不是势所必然。因此，这是一种社会性选择，而不是军事性选择。这项举措事实上为伊斯兰教地区的所有现代部队沿用，甚至包括了利比亚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他们必须使用西式的武器和战术，因为它们可以发挥最有效的攻击；可是他们并不需要穿戴合身的军服和鸭舌帽，但是他们还是穿戴了。这种服饰上的转变，直到今天仍然可作为西方文化的权威性和吸引力的见证，即使是在那些明白表示或激烈排斥此举的人士身上亦然。

纵使是在军服方面，头饰的变革也是最后才发生。在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里，泡在咖啡馆里的男子今天仍然可能戴着一些传统形制的缠头，而这些缠头的设计和颜色，也可能仍代表着这位仁兄的族别和来源地。头本身和戴在头上的东西在象征上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对穆斯林来说，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多数的欧洲式帽子都是有檐有边的，会对穆斯林的敬拜行为构成妨碍。男性穆斯林就像男性的犹太教徒而不像基督教徒那样，在祈祷的时候必须覆帽而不能脱帽，这是表示尊敬的礼节。由于穆斯林在敬拜仪式中必须俯身拜倒，敬拜者要以前额触地，此时帽檐和遮檐就会造成妨碍。有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中东的穆斯林军队已经穿着和西方形制相差无几的制服，但他们仍然没有采用西式的帽子，还是沿用比较接近传统的头饰。苏丹穆默德二世（Mahmud II, 1808—1839）是十九世纪的维新先驱之一，他曾引介了一种新的头饰：毡帽（*fez*，译按：无边圆塔状的毛帽或布帽，上端饰以红缨），一般都根据阿拉伯文，称它为塔布什帽（*tarbush*）。刚开始人们非常排斥和痛恨这种毡帽，认为那是异教徒的发明，可是最后人们还是接受了，它甚至还成了穆斯林的象征物。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Kemal Atatürk），在一九二五年宣布废止这种毡帽，禁令发布之后，人们激烈地反对，其抗拒程度不亚于当初引进时所遭到的强烈反对，而且举的还是同样的理由。凯末尔是位制作社会象征物的大师，当他下令废止毡帽和其他所有形式的传统男性头饰，改采欧式的檐帽和便帽时，他并不是在师法没事找事、反复无常的独裁暴君。这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决定，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当然，抗拒他的那些人，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发生这样的改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大举征服，让

中东心脏地带的穆斯林臣服于一位非穆斯林的征服者，这是自先知穆罕默德以来的第一次。结果是，穆斯林开始采用蒙古人的方法，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伟大的穆斯林将领开始穿上蒙古式的服装，使用蒙古人的马具骑马，把头发留得像蒙古人一样长，而不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把头发剪短。就算是在埃及这个从未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区，他们也采纳了类似的装扮。伊斯兰教军队使用蒙古衣着、装备以及马具的原因，就和今天他们戴上硬檐帽和鸭舌帽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是战胜者的穿着，代表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武力的外观和模样。他们沿用蒙古人的发型和军事装备，直到——据我们所知是在——公元一三一五年，蒙古人在中东地区的统治者改信和同化之后，埃及的苏丹才下令官员们修剪蓄长的卷发，褪去自己和马儿的蒙古装束，回归传统的穆斯林服装和马具。不过在现代的伊斯兰教军队中，我们还没见到这样的回归行为发生。

军队改装之后，宫中也发生了改变。苏丹自己穿着的那种西式服装，是根据西服修改过的，其用意自然是想要和西式服装有所区隔，但差异实在不太明显。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里藏有两幅苏丹马哈穆德二世的优美肖像，分别是在军服改装之前和之后绘制的。这两幅人像显然是出自同一位画师之手，描画的是同一位苏丹骑在同一匹马上，连马的前脚腾立角度都完全一样。可是，其中一幅画的是他穿着传统奥斯曼民族服饰，而在另一幅画作中，苏丹穿的是有饰扣的外衣和长裤。马儿也经历了类似的服饰变革。凯末尔就和他向来的个性一样，直指事物的根基。他说：“我们想要穿文明的服装。”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年代较为古老的文明衣着，会被看作是未开化的呢？因为对他来说，文明指的是现代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

在苏丹改装之后，宫中也开始采用西式穿着。这是最适宜由主政者对市民下旨并命令民众遵从服装事宜的地方。奥斯曼宫廷的官员，开始穿上长外套与长裤，这种新风尚从宫中传到了官僚群中，到了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全国各地的公务员，都穿上了不同剪裁方式的长外套与长裤，这意味着当时的社会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公务员是社会中的重要元素，于是这种新的衣着时尚，很快就从公务员逐渐扩散到其他民众，最后更及于老百姓——至少是城里的老百姓。一般说来，伊朗的服饰变革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晚，而在奥斯曼世界和伊朗世界里的工人阶级和农村人口的洋裁西化，不但耗时甚久，而且至今

尚未完全。不过，即使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共和国代表，穿的仍旧是西式的外套和长裤，只是不系领带，以象征他们拒绝接受西方的习俗和限制。

在衣着的西化和现代化一事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显然表现了比较强大的抗拒性。妇女改装一事，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开始，而且从未像男性那样广泛普遍，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伊斯兰教对于妇女应该谨守谦逊质朴的规定，使这个课题变得十分敏感，容易引发争议。就是连禁戴毡帽和其他形式的非西方头饰的凯末尔，也没有下令禁戴面纱。土耳其共和国里的确有些地方性的规定禁止垂戴面纱，但数量相当有限。废除面纱是经由社会压力和社会渗透达成的，而不是像禁止男性戴传统头饰那样，由法令机构强制执行。在穿着方面的改变，就和在其他层面的改变一样，反映出不同妇女的不同处境。会出现在咖啡馆或小茶栈的妇女非常少，如果有的话，而且就算她们真的出现在这些地方，她们也会谨守传统习俗，把全身都遮蔽起来。然而，穿着时髦服饰——也就是指西方服饰——的优雅女士，还是可以在一些国家里看到，不过她们出入的场所，都是有钱阶级常去的高价位大饭店和精致餐馆。

衣着的变化，同时也象征着一个更大的改变，即使是在那些激进的反西方国家中也不例外。和那些至少做部分西式打扮的个人一样，国家也穿上了成文宪法的外套和立法会议的长裤，并戴上各式各样的选举礼帽。这所有的一切，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里样样不缺，虽然这些事例在古伊朗或是神圣的伊斯兰教历史上，完全找不到先例。

那位小咖啡店里的仁兄，坐在桌旁的椅子上，这两件家具也是拜西方影响所赐的新事物。古代中东曾经有过桌子和椅子，到罗马统治时期依然可以看到，但是，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后，桌子和椅子都消失了。阿拉伯人的故乡树木很少，木料罕见而且珍贵。不过他们拥有丰富的羊毛和皮革，于是他们就应用羊毛和皮革来装饰家居与公共场所，也用它们来制作衣服。人们斜倚在或坐在各式各样的靠垫或褥垫之上，在铺有毛毯或织毯的卧椅（divan）或长榻（ottoman）上——这两个词皆出自阿拉伯语——从精工镶嵌而成的金属小盘中，取用食品和饮料。十八世纪早期的奥斯曼细密画，描绘了欧洲人参加奥斯曼王朝宫廷庆典的情形。我们一眼就可以认出画中的欧洲人，不只是因为他们穿着合身的外套和马裤，也因为只有他们是坐在椅子上面，所以一眼望去十

分与众不同。奥斯曼人真是好客的主人，居然还为欧洲宾客特别准备椅子——他们自己可完全用不上这些椅子。

小咖啡馆里的那位男子，可能正抽着烟——这玩意儿也是西方的舶来品，实际上渊源于美洲。就我们目前所知，烟草最早是在十七世纪初由英国商人传入中东地区，抽烟很快就流行开来。咖啡来得较早，约在十六世纪。咖啡源于埃塞俄比亚，先是传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然后传到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根据土耳其的编年史家记载，咖啡在苏丹苏里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的时代，由两位叙利亚人带到伊斯坦布尔。这两名叙利亚人，一位来自阿勒坡（Aleppo），一位来自大马士革（Damascus），在土耳其的首都开办了第一家咖啡馆。这种新饮品，真是时髦的玩意儿，马上风行四处。据说，来自阿勒坡那位店东，只开张三年就赚到五千个金锭，衣锦还乡。咖啡馆的行业日渐发展，引起政治当局和宗教当局两者的警觉，前者怕人们在那里秘密谋反，后者则关心这种提神饮料是否合乎伊斯兰教律法。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曾下令禁绝咖啡和烟草，还曾处死了不少瘾君子 and 咖啡客。赞成者和反对者，双方在漫长的讨论之后，终于由教法权威——大穆夫提（mufti）迈哈迈德·巴哈·额芬迪（Mehmed Bahai Efendi）在一道“斐特瓦（fatwā）”中，宣布烟草是合法的。迈哈迈德·巴哈·额芬迪是个老烟枪，一六三四年时曾因抽烟被开除，流放出国。同时代一位题名为卡提布·查里比（Kâtib Chelebi，译按：这很可能是官名而非人名，指“中书令”）的奥斯曼作者指出，迈哈迈德·巴哈·额芬迪之所以判定烟草是合法的，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烟枪，而是由于他相信：在法律原则之中，所有未被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此外，他也关心“什么是对于民众的情况最相宜的”。

坐在咖啡馆里的男人，很可能在看报，或许还会因为他所看的报纸而成为众多圈子中的一员。报纸这东西，铁定是最具爆发性而且影响长远的改变之一，不但波及个人，也影响社会。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报纸，是以流通广布于中东大部分地区的阿拉伯语文印制。在肥沃月湾，在埃及、在北非，古代使用的语言早已随时间消失了，就算有侥幸存在的，也只存在于宗教仪式或在少数族群之中。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希伯来语，犹太人把希伯来语以宗教用语和文学用语的形式保存下来，并在今天的以色列国，恢复成政治语文和日常用语。在波斯，其古老语言并没有被阿拉伯语所取代，而是被阿拉伯语所转化。在伊

伊斯兰教降临之后，波斯语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亦掺杂了大量阿拉伯语的词汇。在波斯语身上发生之事，也发生在土耳其语身上，不过，土耳其在那位力行改革的总统凯末尔的强力主导下，一场重大的文化革命就此展开，其内容是废止长久以来一直用以拼写土耳其语的阿拉伯字母，改用新的拉丁字母拼写。这个土耳其的样板，也在一些属突厥语系的前苏联的国家里上演。

自远古时代以来，书写艺术一直是中东地区最精彩的成就之一。字母是中东人发明的，相对于之前的各种符号和图像系统——世界某些角落仍在通行——字母可说是个伟大的改良。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是衍生自地中海东岸商人设计出来的第一套字母。字母一方面大大简化了写作的练习时间和字义辨认，而公元八世纪从中国传入的纸张，又大大有助于书写及其传布。可是，另一项远东的发明，即印刷术——似乎因为某些原因在西传途中过中东之门而不入。西方人不是不懂印刷术，在中古时期还有些木版印刷的遗留。甚至在十三世纪末期统治波斯的蒙古王公，还有过一次印纸钞的记录。不过这位王公用纸钞发薪水，但收税时却坚持要收黄金，于是人们对这种货币便失去了不少信心。这个实验并没有成功，也没有重演。当印刷最终引进到中东时，已经不是来自中国而是传自西方。其传入，显然是在土耳其为人所知，而且有所记录。奥斯曼土耳其的编年史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谈太多异教徒地区的事件，可是有一项记录，讲的却是印刷术的发明，甚至还为古登堡（Gutenberg）及其第一间印刷所带上一笔。印刷术似乎是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由西班牙的犹太难民带到中东地区。他们传入西方的制品、技术和观念，也带来西方刊印的书籍和刊印这些书籍的方法。其他非穆斯林社群，也追随着犹太人立下的典范。这些行为虽然没有在文化主流上造成直接的影响，可是，他们却为未来的发展铺好了道路。穆斯林进口和购买在欧洲印行的阿拉伯文书籍，这点可从奥斯曼国的档案中，保存了一件已故者的产业清单加以证明。到了十八世纪早期，当第一所由穆斯林设立的印刷所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之际，当地已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排字工人，提供了必须有的技术劳工。

报纸到非常晚才在中东出现，虽然有些早期的史料显示，穆斯林早已曾觉到报纸刊印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早在一六九〇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瓦哈布（Muḥammad ibn 'Abd al-Wahhāb）、人称“加萨尼宰



相” (al-Wazir al-Ghassāni) 的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在述职报告中提到：“那个印行报告的墨坊，声称印的是新闻，事实上却是满纸谎言。”十八世纪时，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对欧洲的报章确有芥蒂。甚至有些资料还指出，土耳其人偶尔也会有兴趣读读欧洲人报章里写到他们的部分。报纸传入中东，是法国大革命直接、立时的结果。一七九五年，法国驻土大使馆刊行了似乎是中东地区的第一份报纸：《君士坦丁堡法国公报》(Gazette Francaise de Constantinople)。刊行这份报纸，主要是给法国人看的，可是它的读者当然也包括其他人。在拿破仑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率军打下埃及之后，他也延续君士坦丁堡的办报传统，于开罗刊行法文的报章与政府公报。据闻，有一位法国人计划在开罗办一份阿拉伯文报纸，可是从不曾见过任何一份成品，很可能，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曾实现过。

传统的穆斯林社会里，有几种方式可以让主政者把重大改变告知民众。其中两项，习惯上是主君的专利，一个是钱币上的铭文，一个是星期五在清真寺内的讲道。两者都会提到主政者的名字及其宗主，如果有的话。在固定的祈祷文中加入或删除一个名字，可能就代表着统治者易位——或是经由继承，或是借诸叛乱——或是效忠对象的改变。其他时候的星期五讲道，则可用来宣布新措施和新政策。免除某些税项，也会在公共场所以铭文公告周知——不过，加税就未必会如此。宫廷诗人为主君创作的颂诗，因为容易上口而且流传极广，因而提供了另一种公共关系。官方臣僚发出的文字文件，也是把重要消息带到各处的办法之一，譬如，奥斯曼苏丹便利用“胜利文告”(fathname)来通报军事胜利的消息。穆斯林主政者长期以来就很习惯于使用口语或文字来进行政府与民间的交流，如今又学到了如何使用这个新的舶来工具——报纸。

中东地区的地方性方言报馆，是由两位伟大的改革者奠下基础的。他们是同时代人，也是彼此的对手。他们分别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大人(Muḥammad 'Ali Pasha)和土耳其苏丹马哈穆德二世。在这件事上就和在其他事上一样，穆罕默德·阿里大人拔了头筹，而苏丹马哈穆德则萧规曹随，马哈穆德的想法是，基本上，一位大官能做的事，苏丹定能做得更好。于是，埃及的主政者就从办官报着手，先是刊行了一份法文报，然后又发行了一份阿拉伯文报；而土耳其的苏丹，则同时发行一份法文和土耳其文的报纸。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东地区所发行的报纸全是政府办的，其目的很贴切地表现在当时